

二十五史随笔

河洛苍茫

后汉书随笔

童俊伟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河洛苍茫

后汉书随笔

童俊伟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 者 童俊伟
丛 书 名 二十五史随笔

责任编辑 王立嘉(特邀) 邹 亮
封面设计 张妙夫
封面题字 池长尧

河洛苍茫·后汉书随笔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34000

印 张 6.75

插 页 2

印 数 00001—10500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120-2/I·1030

定 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河洛苍茫话后汉
- 7 王莽的“乌托邦”
- 13 刘秀的人生理想
- 17 可怜更始帝
- 21 昆阳大战：一万对一百万
- 25 刘縯之死
- 29 绿林军与赤眉军
- 33 得众而败的隗嚣
- 37 见小敌怯，见大敌勇
- 41 爱弄小巧的公孙述
- 45 一败涂地的头号功臣
- 49 勇鸷吴汉
- 53 智勇双全的冯异
- 57 寇恂：萧何第二
- 61 刺奸与被刺
- 65 少年英雄的失落
- 69 冠军侯贾复
- 73 臧宫壮志未酬
- 77 慷慨信士来歙

目 录

81	迷信时代
85	超级政客的原则
89	大投机家窦融
94	伏波惟愿裹尸还
99	“爱才”的样板
104	“推荐”制度下的道德
109	拒不合作的严子陵
114	千里送亡友
119	“举案齐眉”的背后
124	思想家的命运
129	乱世才子的尴尬
135	鲍永的立身之道
140	强项令董宣
145	祭彤为何赍恨而歿
151	忠勇不屈的耿恭
156	定远侯班超
161	“孤雏腐鼠”与盖世功业
166	跋扈将军梁冀
171	女后邓绥

目 录

176	外戚、宦官与士大夫
181	清白与无能
186	杨震父子的荣与辱
191	从学生运动到“党锢之祸”
196	大师与现实
202	天才与疯子
208	后记

河洛苍茫话后汉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非同寻常，这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称谓上即可见一斑。

按时间顺序，汉代又可分为前汉和后汉，或称西汉与东汉。照当时人的看法，西汉定都西京长安，承土运，一切以黄色为尚；东汉建都东京洛阳，交火运，所以旌旗衣饰都以红色为主。两汉在公元前后各历时两百年，中间只不过因王莽的新朝间隔了十五年。人们习惯于把两汉视为一个朝代，当然有充足的理由。首先是由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是西汉帝室的苗裔，也即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刘秀不管从父系或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承的前代继承人，因而在历史上他亦被列为最有名的“中兴之主”。

就东汉本身的历史而言，也许没有秦王朝和西汉时代那种开拓进取的宏伟气势，但它的种种实际成就，却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从疆域的开拓及国家的威势看，东汉较前代并不逊色。汉武帝在辽东及朝鲜半岛设立的州郡，东汉依然存在。交趾反叛，由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马援平叛后所立的作为汉帝国南部边界的两根铜柱，居然在如今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半岛上。将军窦宪更是完成了汉武帝及其手下那些驰名千古的英雄卫青、李广、霍去病们至死未竟的事业——彻底打败匈奴。西汉张骞通西域，名声显赫，但他采用的多是贿赂和收买政策。而东汉的班超，所率不过千余名志愿军，却以高明的外交手腕，“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以夷制夷，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将大汉声威推达里海沿岸。他一次组织的联合部队，就可达七万之多，且多以葱岭以西的国家为主。他所开拓的西域疆土，估计连汉武帝时也有所不及，而国家的开支却如此俭省，实在令人难以想像！

在生产技术和科学发明方面，东汉也可称为洋洋大观。南阳太守杜诗设计出的“水排”，就是利用水力转动平向水轮，带动鼓风皮囊，可向炼铁炉连续送风，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冶炼水平，这种水力鼓风炉要比欧洲早一千一百年。四川的盐工们还开发出了一套先进的煮盐设备。他们用竹管把盐卤从盐井里引入盐锅，再用另一套竹管从“火井”里把天然气引入盐灶烧煮，既简便，又高产，这无疑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新技术。如今，四川有一家股票上市公司“川盐化”，却因连年亏损，差点被摘牌，而技术和管理上的原因，恐怕是最主要的。忆古思今，

真叫人感慨万分。另外，张衡、张仲景、蔡伦、华佗……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可以使我们想到，东汉的科学星空是多么的璀璨夺目！

从出土的东汉时代的青铜器、漆器、陶瓷器以及画像砖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生产力的水准和社会生活的状况。可以说，东汉时代中等以上居民的生活，跟近代似乎已无多大的差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经汉代四百年的发展，中华民族从思想、文化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已基本完成了自我角色的塑造而逐步走向成熟。

然而，从东汉直至近代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却一直未有长足的进步，其中的原因，很值得人们反思。仔细阅读《后汉书》，我们也许能够从中找出某些答案来。

东汉一朝，严格说来，只有开头三个皇帝有所作为，即光武帝刘秀的“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政权，并用各种建筑及礼仪使君权更显神秘化；章帝刘烜通过重申儒家宗旨，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体现。但在更多的时候，东汉的朝政基本上都是一团混乱。女后、外戚、宦官、朋党相互争斗，公事、私事不分，贪污、贿赂成风，除了矫情，便是杀戮。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着一件件肮脏的交易，政治上的“黑箱操作”几至登峰造极。千百年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权力运作的一切弊端，至此已暴露无遗，应有尽有。

这种君主专制制度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再经王莽、刘秀一步步发展、定型，关键就在于它的意识形态。

《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讖兴，遂盛行于世。”刘秀与王莽一样，以神秘化的儒家迷信去支持帝业。王莽“篡汉”的主要依据就是梓潼人哀章所献的“天帝行玺金匱图”和“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刘秀登基的“头号文件”也是老同学强华编造的“赤伏符”。著名人物刘歆更是一代讖纬大师，他对《河图》、《洛书》这两大儒学秘籍的研究，影响深远。

刘秀本人既然酷爱图讖，执政后更是极力鼓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说法，这套理论主要来自西汉的董仲舒。这位定“儒家思想于一尊”的人物曾经振振有词地解释说，皇帝是代表“天”来统治人民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也就是说，像“三纲五常”这些纲常伦理，都是上天安排的，永远不能变的。天有春夏的温暖，用来滋长万物，皇帝也就用“仁”、“德”来“爱”人民，“养”人民；天有秋冬的风霜来使草虫枯死，皇帝就要用刑法杀人。皇帝按天的意旨办事，天就用风调雨顺来赞美他，肯定他；皇帝违背天的意旨，天就用灾害怪异来警告他，甚至要降下改朝换代的征兆。因此，所有的天文地理现象，如日食、月食、流星、地震等等，都跟政治与人事有关。“君权神授”理念深入人心的结果，是扼杀了一切民主思想的生长，以及任何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追求。东汉的太学生人数多时虽然号称三万，但他们所追求的知识，全部都是儒家的学说，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从汉武帝时开始实施的“察举”和“征辟”制度，虽然带有

某种推荐性质，被察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或谓之“孝廉”。至东汉时，这一制度又逐步稳定，大约每二十万人举“孝廉”一人。但这样的“选举”，并不能做到公正无私，被举者并不如西方代议政治下的议员那样参与议事，而是被各授官职。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关系，公事往往反成了次要。这种假选举的结果只能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伪君子，有限的“民主”也就完全变了质。东汉末年，面对腐败的朝政，成千上万的太学生们曾在首都洛阳游行示威，向政府请愿，其目的只不过是为请求赦免某些好官或惩治某些贪官，为他们心目中的“好人”或“坏人”张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便是东汉学生运动的主旨。

意识形态领域对君权浓重的迷信色彩，限制了人们在思想上独立、自由的追求。如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在洛阳太学中，就广泛研读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所著的二十多万字的《论衡》一书中，对流行的儒家迷信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以丰富、缜密的论证说明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他却被时人目为“异人”，其书被视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寥寥数行，除了评论他的著作是“始若诡异，终有理实”外，并无更多的抄录或转述。

既然一切都是上天所安排的，那么只要遵从天意，努力做到人事的和谐就可万事大吉。官方并不提倡人们进一步研究自然，改造自然，人们对于科技知识的追求也就

显得不合时宜。伟大的科学巨匠张衡尽管制作出了精妙的浑天仪和地动仪，计算出 π 为3.1622，最终仍为宦官所谗，郁郁不得志，“及后之著作，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真有天壤之别。至于神医华佗，竟命丧专制者的屠刀之下。中国从来不缺伟大的科学天才，所缺的只是真正能够鼓励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政治体制和人文理想。

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比西洋诚然落后，但原因不是中国进步慢或中国人不聪明，慢倒不要紧，慢腾腾地进步也总有个到的时候啊！可按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不用说几十年，就是几百年乃至更长时间我认为中国人也不能造飞机、上天，因为中国人虽然很勤奋、聪明，比任何民族都不弱，一点也没有不如人的地方，可是却走岔了路。……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到人伦关系上面去了。”

尊儒信天而排斥其他思想，重视社会关系而忽略自然科学，中国人在汉武帝时代便开始走岔了路，到了东汉时就已完全深入岔路而不知回返，结果是一条道走到黑，直至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国门。其实，梁漱溟先生的反省还是相当温和的，仅把民族的落后归之于用错了精力。实际上，中国人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迷信和盲从，对那些披着神圣外衣的理论不敢批判和摒弃，或许是这场千年悲剧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王莽的“乌托邦”

19 世纪初，英国的莫尔提出了人类历史上著名的“乌托邦”理想，这一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历史。而早在一世纪初，中国就已经有人构思和实践过类似的理想了。这人就是“臭名昭著”的王莽。

说他“臭名昭著”，是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史书上，王莽向来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出现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正像唐诗中的名句所言，王莽早已成为“阴谋”、“虚伪”、“篡逆”的代名词。

近代以来，有人试图为他平反，或宣称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或赞誉他“从事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的社会改革”，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王莽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他那所谓的“篡逆史”。

西汉末年，王莽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外戚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儿子汉成帝继位后，

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而王莽则由于父亲早逝，没有得到什么爵位，孤儿寡母，惨淡度日，在王氏一族中最显贫寒。他与那些骄横跋扈的堂兄弟们不同，从小就勤奋好学，长大后精心侍奉孤母寡嫂，抚养侄儿，又特别谦逊有礼，深受大家的好评。可以说，王莽在青少年时代，就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

一次，他的伯父大将军王凤病了，王莽赶去侍奉，非常尽心。他亲尝汤药，蓬头垢面，接连几个月昼夜不脱衣服，守候在旁。王凤临终时将他托付给王太后和汉成帝，王莽才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又被提拔为射声校尉。

进入仕途后，王莽更加谦虚谨慎。他不断拿出薪金供养和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众人。他越升官，越是谦逊，朝野上下，纷纷传颂着他的佳话，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三十八岁那年，王莽当上了大司马。执政后，他依旧克己奉公，聘任贤良为官，重用有德有才的知识分子，把朝廷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大都分送给士人，自己的生活也极其俭朴。他对自己和家人处处严格要求，有两件小事就得很能说明问题。一次，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出来迎接她们的却是一位穿着粗衣短裙、衣不蔽体的女士，探病的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才知是堂堂大司马的夫人，都不觉大吃一惊。另一件事是，王莽的儿子王获杀死了一名奴婢，这在当时的官家贵族中是最寻常不过的事。王莽却大为震怒，对儿子严加叱责，竟

命令他自杀。

从阳朔三年（公元前 22 年）步入仕途，到“篡汉”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共花了三十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王莽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多少可加谴责的地方。相反，在西汉末年那个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多的社会里，王莽的这种不贪不虐、廉洁自律的精神，倒显得特别的难能可贵。尽管后人不断地评说他的“阴谋”和“虚伪”，但东汉的史臣们并没有举出多少实例。几十年来，他并没有表面吃素食，背后喝参汤，外面布衣粗服，里面绫罗绸缎；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地里又去偷偷搜刮回来。在那奴婢的地位贱如牛马的时代里，王大公子偶尔杀死一个，实在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王莽却逼令儿子自杀殉命，并没有装模作样地处理一下，甚至不闻不问，一笑了之。他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绝不是偶然的。他在“篡汉”的过程中，也没有受到多大的阻力，或听到多大的反对声浪，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威信和受欢迎的程度。

王莽礼贤下士，重视教育，爱惜知识分子。他网罗天下硕儒和有特殊才能的几千人到首都长安，号召人们为学者们建造一万套住宅。学生和老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参加义务劳动，十万人突击，二十天就全部建成。遇有灾荒，他带头节衣缩食，不吃肉食，还捐钱捐物，减免租税，赈济灾民，做得有声有色。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办公，处理国家大事。这样的模范政治家，历代以来似乎也不多见。

他被人称颂为圣人、周公、救世主，虽然不乏夸大的成分，但在那样腐败透顶的社会中，在人们普遍对现实不满，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情况下，王莽的出现，的确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光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吹捧不出来的。

如果说王莽三十年的出色工作是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虚伪”地装出来，这代价确实也已够大。还有他从青少年时代起的种种表现，如果也是“虚伪”的话，那他直至五十二岁做上新朝的皇帝，这大半辈子的生活，实在也是太苦太累了。其实，抛开传统的正统观念，王莽的“篡汉”毫不足怪。除了他不姓刘，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成帝、哀帝、平帝他们强。而且，王莽与历史上所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和“伪君子”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导致他彻底失败的种种政策和措施，并不在他做皇帝之前，而是在他做皇帝之后。倘若仅仅为了篡权，王莽的目标已经实现，再也没有必要去冒险了。古往今来，多少野心家一旦大功告成，便改弦更张，抛弃先前种种美好的诺言，仅为保住自己的权位而采取种种现实主义的方针。而王莽却偏偏不这样，他当上皇帝之后，反而提出一个更为宏大的改革方案。

王莽“托古改制”的内容相当广泛，今天看来也不乏积极意义和闪光之处。诸如实行土地国有，全国的土地都改称为“王田”，私人不准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多年以前已经废除了的井田制度；耕地重新分配，一夫一妇可占田百亩，有剩余的分给别人，不足的由政府补足；不劳动者

不得食，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参加劳役；实行专卖制度，凡酒、盐、铁器等生产生活资料由国家专卖；统一货币和金融，私人不准铸钱，山上水中的自然资源，概为国有，由政府授权开采；建立新的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需要，可向政府申请无息贷款，如因生产经营所需，则可向政府申请取得有息贷款（纯利的10%）；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粮食布帛之类的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按成本价收买，求过于供时，由政府卖出；征收所得税，一切生产经营，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可自由经营，如今新政府都要征收纯利10%的所得税，然后将它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基金。等等。

王莽这些充满近代色彩的经济改革方案，博得了一批现代人的喝彩，因而被称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但在当时，改制的结果却是“富者不能自得，贫者无以生存”，王莽也因此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人们总结其中的原因，有的人从技术上看，认为以当时的管理水平，根本就无法执行这种复杂的赋税制度；有的人从政治上找答案，认为王莽所依靠的官员腐败无能，再好的政策一到这批贪官污吏手上，都会变成他们谋取私利的法宝。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必然要失败。另外，还有人认为王莽可能精神失常，比如他经常不厌其烦地更改“官名”、“地名”，徒增混乱，又没来由地